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3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5)

改革时期广东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方 华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在考察广东农民收入增长过程及其结构变动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测算了改革时期广东农民收入增长的来源结构。结果显示,广东农民收入在取得巨大增长的同时,其增收的来源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农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逐渐下降,但贡献率仍较大;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民增收影响较大;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增收有积极作用,但贡献率不大。

关键词:改革时期;农民;收入增长;广东;来源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3-0007-07

一、引言

"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广东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省份,工业化水平走在全国的前列,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东已经很好的解决了"三农"问题。相反广东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建立全面小康社会,必须正视和解决"三农"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国农民收入增长率持续下降以来,农民收入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陈锡文[1]、林毅夫[2]等人把新阶段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核心归结为农民收入的增长问题。研究广东农民收入问题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民收入受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民占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农民自身素质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首要因素[3]。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农业劳动力的非充分就业,农村劳动力聚积在少量的土地上,导致劳动力边际产量的低下,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4-6]。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要靠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非农产业,进行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另一方面要允许农民自由流动到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系列偏向性的制度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7],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对增加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8]。

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部分[9],农业发展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忽视。不过,我国农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产品已基本告别供不应求的短缺时代,不能再靠单纯增加农产品产量来增加农民收入,而必须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10],发展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来达到农民增收的目的。

本文在现有理论研究基础上,实证研究改革时期广东农民收入的增长过程及其相关贡献因素,为提出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提供实际依据。文章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改革时期广东农民收入的增长过程作统计描述;然后建立一个计量经济模型来具体测算这一时期影响广东农民收入增长的诸因素及其贡献大小;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对策建议。

收稿日期:2006-05-16

作者简介:方 华(1982-),男,安徽舒城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二、改革时期的广东农民收入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场以落实家庭承包经营制为开端的农村综合改革迅速地在全国展开,广东也不例外。改革极大地增加了农业产出,显著地提高了农民收入,同时也改变了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

(一)农民收入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193.25元增长至2004年4 365.87元,27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了四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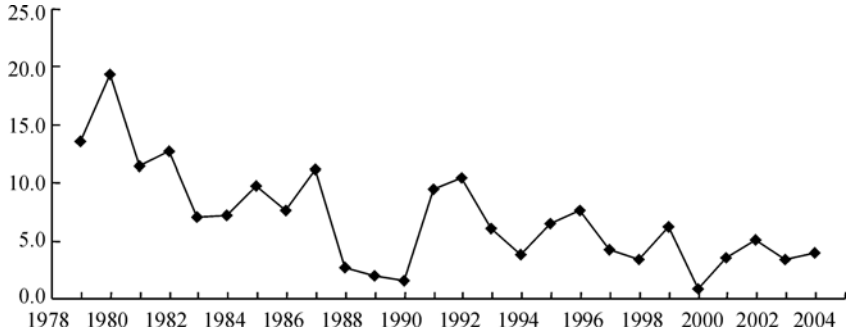


图1 广东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数据来源:2004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广东统计信息网。

1978~2004年间广东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6.9%。农民收入的增长是一个波动起伏的过程,总体来看,广东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明显不同的时期(图1)。

1. 快速增长期(1978~1987)

这一时期从1978年开始,持续到1987年,年均实际增长11.1%。其中198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9.4%,为改革以来广东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

家庭承包制改革确立了农民家庭经营自主权和收益权,农民被压制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释放,粮食等农作物产量增产明显;与此同时,广东省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多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产量的增长和价格提高共同促成了农业收入增加,并成为这一时期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不仅如此,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为为农民开辟了另一个增收的天地,成为该时期农民收入增长的第三个源泉。

2. 缓慢增长期(1988~1990)

一度快速增加的广东农民收入自1988年开始陷入连续三年的低速增长中,年均仅增长2%。由于前期实行的扩张型宏观经济政策,部分经济领域出现了过热现象,加之前期价格改革的积累效应,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开始,全国经济进入为期三年的整顿时期,物价大幅下降,农产品价格随之回落,农业经济效益下降;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放慢,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减少,部分外出劳动力回流,造成了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增长速度一度大幅下降。

3. 波动增长期(1991~1996)

进入90年代,广东农民收入增长有个好的开头,1991,1992连续两年增长速度达到9%和10%。但这种良好的势头并没有保持下来。1993年,全国进入新一轮通货膨胀期,高通胀侵蚀了农民收入增长的潜力。从1994年起,广东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增长,但由于粮食价格在波动下降,

农民收入增长并不大。

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增长的波动起伏,年均增长 7.3% 。

4. 低速徘徊期(1997 年至今)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农业生产在取得连续几年丰收后,结构矛盾开始突出,农产品质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增大;受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广东农产品出口受阻,国内市场低迷,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加之农民税费负担沉重,种种的矛盾集合共同导致了 1997 年以后广东农民收入的增长低迷,年均增长仅 3.8% 。

(二)农民收入的结构变化

改革前,农民收入主要来自生产队等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报酬收入,随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完成,家庭承包制成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形式。农民基本收入主要来自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表 1)。

表 1　广东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按收入来源分)　　单位:%

收入来源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3
工资性收入	47.6	47.2	16.6	23.5	26.4	37.3	48.5
家庭经营纯收入	41.8	44.9	75.4	71.5	65.1	54.8	43.4
转移性收入	10.4	7.7	7.4	4.2	6.7	5.9	3.6
财产性收入	0.2	0.2	0.6	0.8	1.8	2.0	4.5

数据来源:2004 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

从收入性质来看,生产性纯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农业生产性纯收入一直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非农经济活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日益增大,成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导性因素(表 2)。尽管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比重在逐渐的减小,但农业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收入中种植业、牧业和渔业收入是主要部分,其中种植业是重中之重[11]。

表 2　广东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按收入性质分)　　单位:%

收入性质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3
生产性纯收入	89.4	92.1	92.0	95.0	91.5	92.1	91.9
农业生产性纯收入	82.0	81.6	65.1	57.7	46.5	37.9	31.8
非农业生产性纯收入	6.8	10.5	26.9	37.3	45.0	54.2	60.1
非生产性纯收入	10.6	7.9	8.0	5.0	8.5	7.9	8.1

数据来源:2004 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

三、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测算

农民收入来源按产业性质划分可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农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农民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出售农产品获得的收入;农民非农产业收入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即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收入、农民从本地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外出打工收入[12]。本节通过计量经济模型来测算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大小。

(一) 模型与数据

基本计量模型设定为:

$$INCOME_t = \alpha + \beta_1 \cdot APRICE_t + \beta_2 \cdot AGDP_t + \beta_3 \cdot TVE_t + \beta_4 \cdot MIG_t + u_t \qquad (1)$$

被解释变量 *INCOME* 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解释变量 *APRICE* 为环比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AGDP* 为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的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①],代表农业产出水平的变动;*TVE* 为经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率,代表农村非农产业增长;*MIG* 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②]。变量数据均根据各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和《广东统计年鉴》原始数据计算。

(二)模型估计

本文模型为时间序列模型。处理时间序列模型需要特别谨慎,如果模型中变量为带有一个单位根的非平稳序列,直接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产生"伪回归"。针对这种潜在的威胁,估计模型之前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

1. 序列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 ADF 法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使用计量软件 EViews3.1[13],结果如表3。

表3 序列平稳性检验

检验序列	检验类型(c,t,k)	T统计值	5%临界值
INCOME	(c,0,1)	-3.44*	-2.99
APRICE	(c,0,1)	-3.52*	-2.99
AGDP	(c,t,1)	-4.32*	-3.62
TVE	(c,t,4)	-4.50*	-3.65
MIG	(c,0,1)	-4.18*	-2.99

注:检验类型(c,t,k)分别代表检验方程中是否有截距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按照 AIC 标准,即选择使 AIC 值达到最小的滞后阶数;5%临界值为 Mackinnon 临界值。

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这些变量均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对平稳时间序列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不会产生"伪回归"等谬误。

2. 参数估计

遵循"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对(1)式进行回归分析。为考察农民收入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滞后响应,在估计过程中将价格变量滞后2期进入模型。第一次估计结果见表3第1列(模型1)。模型1结果显示估计过程很不理想,调整后 R2 和 F 检验值均较低。自相关性检验中,D. W. 统计值1.62,落在不可判断区域;进一步用布劳殊—戈弗雷检验(LM 检验),检验值为0.84,相应的概率为66%,说明不存在自相关性问题。怀特异方差检验值为20.7,p 值为0.02,说明模型有明显异方差性。

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消除异方差性,选择农村人口增长率 *POPU* 为权变量,回归得到模型2的结果。模型2的调整后 R^2 较模型1有较大提高。对模型2进行自相关和异方差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性。但变量显著性检验(t 检验)显示,MIG 和 APR 均不显著,有必要剔除这些变量。

模型3和模型4汇报了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后的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模型4有较好的统计性质。为此,得到如下的估计模型:

$$INCOME_t = -0.0333 + 0.0014 \cdot APRICE_{t-2} - 0.0009 \cdot APRICE_{t-1} + 0.4676 \cdot AGDP_t + 0.0820 \cdot TVE_t \quad (2)$$

(2)式显示,农业总产出的增加和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民人均纯收

① 对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始于1984年,本文在处理1978~1984年间的数据时用广东省消费品价。

②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计算方法是:(农村劳动力增加额-农业劳动力增加额)/农村劳动力。

入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变量t检验显著)。农业总产出每增长1%,农民收入相应增加0.46%;非农产业产值每增长1%,农民收入增长0.08%。农产品价格也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不同的是,价格对收入的影响有滞后效应,当期价格对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滞后2期和滞后1期价格对收入有明显影响;农产品价格上升总体上会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滞后2期的估计值为正,滞后1期为负,但正值绝对值大于负值)。

表4　参数估计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C	0.0187 (0.21)	-0.0147 (0.24)	0.0040(-0.05)	-0.0333(-1.39)	0.0080(1.30)
APRICE(-2)	0.0012** (1.61)	0.0012 (1.77)	0.0011 (1.68)	0.0014** (3.18)	
APRICE(-1)	2.91E-05(0.03)	-0.0007(-0.94)	-0.0006(-1.03)	-0.0009* (-2.10)	
APRICE	-0.0012(-1.70)	-0.0003(-0.62)	-0.0003(-0.39)		
AGDP	0.3340* (2.56)	0.4586** (5.33)	0.4541** (4.86)	0.4676** (6.27)	0.6071** (15.29)
TVE	0.0854(1.33)	0.1089(1.69)	0.0967(1.80)	0.0820* (2.16)	0.0993** (3.25)
MIG	8.84E-05(0.03)	0.0010(0.50)			
加权变量		POPU	POPU	POPU	POPU
调整后 R^2	0.58	0.95	0.95	0.95	0.94
F值	6.13**	25.52**	31.98**	41.07**	70.53**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分别表示在5%、1%水平下显著。

表4还报告了只有农业总产出和乡镇企业总产值为解释变量的模型5。与模型4相比,模型5的统计性质有所下降,但变量的弹性值和相应的显著性检验值均有所增加。

(三)贡献度测算

根据(2)式,测算出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业总产出和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结果见表5。

表5　农民收入增长因素贡献分析　　**单位**:%

贡献因素	1980~1987年	1988~1990年	1991~1996年	1997~2003年	1980~2003年
APRICE	4.87	24.56	3.95	-7.02	3.63
AGDP	53.63	37.73	34.83	21.95	37.71
TVE	34.71	-3.54	32.10	34.92	29.34
合计	93.21	58.76	70.87	49.85	70.67

注:各期贡献度和不等于100%,差值为其他因素(如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等)的影响。

由表5可以认为:

(1)提高农产品价格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但贡献不大。在整个考察期内农产品价格对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度约为5%左右(模型的估计值为3.63%)。不过,在这一贡献值在不同时期变化较大,其中1997~2003年间贡献率为负值(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一度连年下跌)。

(2)农业总产出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较大。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1980~1987年间,农业总产出的贡献大于50%;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农业总产出的贡献仍大于30%;这一贡献值在1997~2003年下降为20%多,说明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农民增收的第一重要因素不再是农业总产出增长。

(3)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乡镇企业发展对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贡献较大,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除1988~1990年间贡献为负以外,其他时期的贡献均于30%;1997~2003年间,农业总产出对收入增长贡献下降的同时,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第一贡献因素。

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

(1)广东农民收入取得了巨大的增长,改革以来20多年内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了四番。广东农民收入增长态势明显地分为四个不同时期,即快速增长期(1978~1987年)、缓慢增长期(1988~1990年)、波动增长期(1991~1996年)和低速徘徊期(1997~2003年)。

(2)农民增收来源结构有明显变化。改革初期至80年代后期,农业收入增长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模型估算这一时期农业总产出增长对农民增长的贡献度大于50%。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一贡献率开始下降,但农业收入仍然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3)农民非农收入增长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乡镇企业发展对增加农民收入功不可没,改革期间,除1988~1990年间外,乡镇企业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均大于30%;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农民外出就业也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二)政策建议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广东的大背景下,充分认识"三农问题"和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性,从农业、农村内外两个方面着手,确实增加农民收入。

第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业收入仍然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因此不可忽视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发展有竞争优势的特色农业,挖掘农业内部增收可能途径。

第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支持各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提高农民市场化、组织化程度,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增强其带动农户、开拓市场、争创效益的实力;创新经营管理和农户联结机制,形成强大的龙头企业群体;改革完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协会、商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开拓市场能力。

第三,逐步推进农村工业化。进行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和技术升级,促进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为农民就地提供非农就业机会;发展民营经济,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和流通工业,增强工业促进农业、带动农业的能力。

第四,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长远地看,要搞好城乡规划,完善中心城镇建设和农村市政建设,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变农民为市民;当前,要消除城乡间各种歧视和就业壁垒,对外出劳动力进行就业培训,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

总之,增加农民收入,既要挖掘农业内部潜力,调整结构增加效益,又要突破农业局限,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找出路,增加非农业收入;既要在农村发展和改革上下功夫,更要跳出农村圈子来解决农村问题,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为农村、农业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陈锡文.试析新阶段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J].宏观经济研究,2001,(11).

[2] 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03,(1).

[3] 王雅鹏,郭犹焕.有关农民收入问题的理论浅析[J].南方经济,2001,(5).

[4] 郭书田.中国农村:劳动力分化及社会结构变化[J].科技导报,1999,(1).

[5] 吴敬琏,林光彬.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三农"问题[J]. 宏观经济研究,2002,(6).
[6] 温铁军.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两个基本矛盾[J]. 群言,2002,(6).
[7] 胡鞍钢. 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四种社会[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8] 王德文,蔡　昉.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与农民增收[J]. 中国农村观察,2003,(4).
[9] 傅　晨. 聚焦:中国农村改革热点和重点问题研究[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10] 张晓山. 农业结构调整五大问题应重视. 经济工作导刊,2000,(22).
[11] 冯平等主编. 广东现代农业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12]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广东省统计局编. 广东五十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13] 温思美,冷和明. 广东农民收入:现状、问题与对策[C]//张德扬主编. 广东农民增收研究.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14] 鲜祖德主编. 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15] 张晓峒. 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 使用指南[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16] [美]达摩达尔·N·古扎拉蒂. 计量经济学基础(第四版)[M]. 费剑平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A Factorial Analysis on Farmers' Income in Guangdong

FANG Hu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armers' income issue in Guangdong. After reviewing the growth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Guangdong farmers' income, an econometric model is developed to analyze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farmers' income. The result is: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contributed a lot, but its contribution is degressive;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uch as TVEs etc., was a great contributor, while the price of agro-product had a small contribution.

Key Words: reforming period; farmers; the growth of income; Guangdong; the structure of farmers' income